

以英雄的名义“塑”说“雕”琢

□徐亚娟 陆少平

择一事,爱一生。这可能就是青年雕塑家李平的写照。从城市雕塑到把目光聚焦到抗联英雄雕塑上,一凿一刀雕刻着时光。十年,不短的时间,《赵尚志将军》《夏云阶将军》《冷云碑》等100余座抗联题材作品、一座座抗联指战员们的雕像组成成群,就像丰碑屹立在英雄们战斗于斯、长眠于斯的黑土地上。

日前,笔者来到佳木斯市见到了“为抗联英雄塑像”的李平。

李平站在佳木斯市创业孵化园“李平雕塑艺术工作室”门口,看起来像一个在校实习的大学生,淳朴实在的样子似乎就是邻家大男孩。推开工作室的大门,当他和眼前那组雄浑悲壮的《东北抗联千里西征》雕塑作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体会,他的朴素中蕴藏着执着,谦虚中浸透着自信。

2008年,23岁的李平从北京回到故乡佳木斯市,成立了李平雕塑工作室,同时注册成立了佳木斯市东极丽景景观雕塑艺术有限公司。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推算,2001年入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2003年第一件代表作品大型壁画《阳光》系列在北京面世,2003年成为中央美院雕塑工程部实习生,2006年雕塑设计作品《同一个世界共一个梦想》获北京奥运国际雕塑征集佳作奖,《射》获得优秀奖,《大中华》获得集体一等奖。从16岁到23岁,7年的时间,李平完成了学业,创办了公司,独立和合作完成了上百件雕塑作品。他完成了一个少年从家乡



启程,在北京求学奋斗,满怀理想重回家乡的成长历程。也是在这样的梳理过程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个雕塑艺术人才脚踏实地的成长之路。李平说,跟别人比,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自己肯定比其他人勤奋。

回到家乡的李平,开始用更多的时间来研读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从工艺上的匠心到思想上的确立、情感上的投入,让雕塑作品和城市的历史文化气息相融合,让雕塑作品和这座城市的脉博同频跳动,成为城市之眼,家乡之魂。

2008年,佳木斯市沿江十里景观带东段建设知青广场,面向社会征集“知青广场”的雕塑设计方案,80后的李平,能否理解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担起知青广场这样复杂的主题雕塑设计?他每天放着知青时代的歌曲,翻看知青文学作

品……那些在歌曲和文字中流淌的思路最后汇集到一起,一头倔强的垦荒牛出现在他的设计图上,《开创新时代》诞生了。该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出现了,全国知青代表将汇聚佳木斯参加首届知青节,同时要观摩知青们捐建的知青广场。留给李平这座15米高的不锈钢、大理石、铸铜混合材质的雕塑建筑的施工时间只有45天。因为运输问题,他不得不再调整施工方案,把石材从北京运到佳木斯施工现场加工制作。自此开始,李平每天早晨4点准时带着50多个石刻工人在现场雕刻,每天工作14个小时。经过40天的努力奋斗终于全面竣工。李平和他的团队得到社会业界的认可,作品获得当年建设部全国城市雕塑工程项目年度大奖。

同年,佳木斯市政府面向社会征集,

赠予友好城市——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的雕塑方案,李平设计的象征着中俄两国睦邻友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结》方案中标,得到中俄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这件作品至今屹立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广场。

2012年,李平完成了大型雕塑《抗日英雄冷云》的创作,抗日英雄故事《八女投江》中指导员原型冷云的故乡是佳木斯市桦川县。这部作品高4.5米,宽18米,材质为花岗岩,人物为胸像造型,底座为水纹造型,寓意冷云精神融入了这片土地和江水,后面浮雕为八女投江的场景,英雄冷云神情坚毅,视死如归,再现了当年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情景。这幅作品屹立在桦川县沿江公园冷云广场,已经成为当地著名地标。这部作品让英雄女儿魂归故里,成为故乡亲

人凭吊瞻仰英雄女儿的寄托。

2017年9月,李平组建了6人的创作小组,10人的资料小组,历时半年时间,完成了架上组雕《抗联千里西征》的创作,获得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扶持基金50万元,作品画面中呈现了士兵、将军、老百姓等120余人,有9组故事贯穿其中,再现了完整宏大的战争场面。

目前,李平正在全力投入《抗联千里西征》大型石材组雕作品的创作,这套大型雕塑是原架上雕塑《抗联千里西征》的扩大版,其中最大的一座长50米,高14米,全部作品预计在2020年完工,2019年4月份开始安装该项目的第一组。这套设计方案得到了社会资本的投资,整体投资达2千万元,即将落户在汤原县国家原始森林公园。

2009年至今,李平创作了《汤原会议》《赵尚志将军》《夏云阶将军》《冷云碑》等100余座抗联题材作品。

李平说,10年的时间,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抗联题材作品的创作中,抗联题材已经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他要带领团队深入挖掘东北抗联先烈的事迹,把那些遗失在历史一隅的抗联英雄们都做成雕塑,让更多的人知道抗联、了解抗联、传承抗联精神。今年是建国70周年,他要以一座免费公园的、占地3000平方米的抗联雕塑展览馆向祖国献礼,同时要把自己多年来创作的抗联作品微缩版展示出来,通过展览、展示等活动来推动抗联文化的传承。

龍江故事

被图像改变的写作

□杨勇

文學地圖

图像的繁荣,尤其摄影、电影以及后来的高端电子信息影像术的产生和传播,使人类本身的感官性得到了扩张,观看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加开阔。

毋庸置疑,影像改变了传统绘画艺术,使得画家们摆脱了绘画纯写实功能的束缚,走向了广阔的现代主义形式探索。在写作中,影像的革命性后果是删除了传统小说中不厌其详的自然环境、社会风物、家居背景、人物面貌等的描写。也就是说,因人们普遍的观看性扩大,对影像中内容经验及印象的使用,却掉和解放了传统小说中构屋架房布局场景人物衣着外貌等冗繁的包袱,从而让后来的作家们轻装上阵,催发了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小说。

如此,我们看到,沃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乔伊斯、卡尔维诺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几乎没有前章作家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传统小说中冗长的摄影功能式的静态事物描述,后来者们将描述之慢转化为一种叙述之快。

现代主义的小说,更注重形式的可能性,思考的广度性。小说形式上简洁、线条、抽象、叙述节奏快,内容上则偏重探索和思考精神,其文本内在象征隐喻寓言及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是丰厚的。

图像对文化影像采集,也改变了写作的地域特色。这里先说一个事实:随着科技的继续发展传播,当今世界,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新感和陌生感都被穷尽了,它们通过各种信息传媒以图像、文字形式向世界各个角落呈现。世界的经济彼此牵涉,文化多元交织,意识多元交汇,人类的价值观正在跳出狭隘,步向整体主义。

所以,在写作的传统中,鲁迅、萧红、沈从文、福克纳等强制化的地域特色的写作,正在被更开阔的地域视角所冲淡。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地域特点的写作和坚守,也只是成为一种策略,不再是绝对的。

在潜移默化的全球化命运滋养中,一个作家能写中国,外国,地上,天上的事物,都变得不再奇怪。我注意到一个事实,没有“生活”的80后,90后作家们充满玄幻,虚构中的虚构,象征和想象力的超地域写作有着强大的说服力。而他们的前辈作家,百科全书式的不乏其人,这是现实一种,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

我注意到,在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的笔下以及更多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表达中,地域特色是比较暗淡和隐约的。他们广度的全球化视野,已成为对人类不可分割的整体命运的艺术关照和思考。像卡佛那样写作的简直和加速叙述化也是一种倾向,精致的地域特色写作经营模式在悄然改变。

在当代,地域性写作的坚守,也只有深度挖掘跳出表象,具有化解现实能力,深入到真相后,才有可能性,否则是画地为牢。



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从上小学开始为何那么嗜睡。课间10分钟休息,也得趴在课桌上眯一觉儿,放学回家后帮妈妈做完家务,吃过晚饭,就躺在炕上呼呼大睡,有时连衣服也懒得脱,一睡睡到次日天光大亮。我奶说:“困了就睡吧。等你过了50岁,觉就越来越少了,想睡也睡不实诚呢。”我奶说得对!

睡不着,我就信马由缰,胡思乱想。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志向,想当音乐家。为什么是这个志向?因为那时我有当音乐家的条件。

从内部来说,我妈年轻时唱过评剧,我妈虽然身在业余剧团,但唱得专业。那时我还没出生。说我妈唱新风霞“新派”唱得最像最有味道,是在我记事后我妈同学甄婉儿说的。会唱评剧的妈妈给了我艺术基因。不是吹牛,那时别看我只有七八岁,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但我唱歌不跑调儿。对当时那几百人们经常唱的歌曲,虽然我不识谱,但听几遍就会唱。不仅会唱,还能用口琴吹出个调调,就凭这“天赋”,我刚上14岁,就毫无悬念地被公社选为广播站业余播音员、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业余演员。

从外部来看,条件也不错。我爸的一个同学,比我爸大一岁,唤他大爸的。他家和我家一样,都住土坯房;他和我家一样,不管什么时候进屋,总能嗅到肥皂的淡淡清香。他和我家一样,物质贫乏,物品摆放却很整齐。唯独不一样的,是这位大爷有一把小提琴,挂在他家一进屋就可看到的用报纸糊的那面墙上,发着红黄相间的耀眼的光泽。好像在长满一片黄花的大地上,一下子蹦出一枝刺眼的玫瑰,既风光又灿烂。这东西吸引我经常去他家,使我站在那里长



久地发呆,只是看,不敢摸。偶尔见大爷面露笑容,我就乘机试探着哀求:大爷,你拉一曲吧!“你听不懂,拉什么拉!”我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出他的家门。但受小提琴的诱惑,我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脚,情不自禁地三天两头去他家,用垂涎欲滴的眼光瞄向小提琴,做着想当小提琴家的白日梦。我不知道,大爷这把小提琴是咋来的;我知道,当时我出生的那个3000多户人家的公社(如今叫镇政府所在地),别人家是万万买不起这玩艺的。直到有一天,他家大女儿(与我同龄,比我早出生四个月)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以后别上我家来了。我爸妈怀疑咱俩搞对象!”哎呀妈呀!我才十来岁,哪知道搞对象啊!再说了,那时我们那里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封闭,男女娶嫁要从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别说小孩子,就是大人自主搞对象,都往往被人耻笑,甚至在你身后指指点点,说一句“要流氓”。我不敢去他家了,真的不敢去了。

我想当小提琴家的白日梦彻底破灭。我当兵三年后第一次探亲,我爸说你那位大爷年初去世了,小提琴也不见了。我说,真遗憾!我没有看过大爷拉琴。我爸接着说,我和你这位大爷相识50多年,我也没看到他拉过小提琴。这次探亲我才知道,他的大女儿没有嫁给搞音乐的。后来,大爷家另外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也都没有娶妻搞音乐的。

1974年麦穗微黄,苞米灌浆的时候,我被校长告知:你被选为公社广播站业余播音员,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业余演员。到1976年底,文艺宣传队宣告解散。在宣传队,我对一位拉京胡的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做起想当音乐家的白日梦。这位看上去50岁左右,个头高高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胡须剃得光光的,穿戴整洁,他的行为举止与别人不太一样。后来我理解,这位老师身上有一种华贵之气。听我们团长范叔说,这位老师姓刘,原是山东省某京剧院

的著名京胡演奏家。后来京剧院解散,刘老师投奔亲属,举家迁移到我的家乡,进行劳动改造,以便日后脱胎换骨。刘老师说我“具备京剧老生演员的基本素质,值得好好培养”,就给我“吃小灶”。在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训练下,我终于登台表演,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唱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唱得有点儿像原唱,得了奖,一个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扉页上写有“大学小靳庄,唱得满天红”几个歪歪扭扭的钢笔字。这可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个社会奖励,况且那上面印有公社革委会的大红印章。所以,尽管我还不不知道小靳庄是个什么地方,又为什么向它学习,但还是如获至宝,很郑重地揣进小棉袄里兜,紧贴心脏。我妈最高兴,晚饭给我煮了一枚鸡蛋,算作家庭奖励。往后,我继续学唱京剧,没啥进步,倒对京胡有了兴趣。不知为啥,在我眼里刘老师拉京胡的架势非常带劲,京胡所有部件好像是从他身上长出来似的,演奏起来十分娴熟。他拉弓子,不是在拉,像在拽;他按琴弦,不是在按,像在弹。那美妙的琴音,不是从我的感官系统进入的,像从头顶盖骨钻进来的。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感觉至今还有。所以我说,京胡美妙的音色我用头顶能充分感受,耳朵听音倒列其次。欣赏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搔首拍膝。刘老师看出了我对京胡兴趣浓厚,就教我学拉。他对我说:“唱京剧的人很多,干这一行,将来难以出人头地。拉京胡的人不多,你要是学好了,准能有出息。”可是,我家买不起京胡。再后来,刘老师故去了,我去当兵了……

日子过得真快呀!再过两年,我60岁啦。想当音乐家的往事,连同年少时萌发的所有理想志向,统统尘封于历

史。年轻有年轻的激情,年老有年老的稳重。年轻人过于稳重,那叫老气横秋;老年人过于激情,那叫神经错乱。年轻时作文,好在形容词和成语上费思量,绞脑汁,聚拢一大堆华丽辞藻,看上去好像挺有才,实则言之无物。如今为文,才知道那些朴实的“大白话”才是“人话”,简洁生动,表达准确,便于理解。

年轻有年轻的志向,年老有年老的理想。虽然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距离,且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人不能因此而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会失去人生的正确方向,就会暗淡生命之缤纷色彩。倘若问我现在有什么理想,我一时还真的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是大道理,能说清楚的是最简单也最管用的“大白话”,这就是:做人,往实了做。无一日敢懈怠,无一日敢马虎。绝不溜须拍马,绝不马首是瞻,绝不虚头巴脑,绝不咋呼咋呼呼。活出个“自我”给自己看;工作,往好了干。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工资。属于自己该干的,绝不推给别人;能当天完成的,绝不拖到明天;处事,内存自知之明,外听逆耳之言;绝不妄自菲薄,绝不妄自尊大。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就是余生,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才应该过好每一天,活出快乐,活得有滋有味。真正快乐的人,并不是在生活中到处寻找快乐的人,而是把生活本身变成快乐的人。

这样想着,困了,眼皮打架,睡吧。做了个梦,梦见千里之外的我那两盆文竹,四个月来在亲属精心侍弄下长得蓬头蓬脑,活像两把绿油油可爱的小伞。亲属问我,要不要修剪一下?我说,不用,只管任它们自自然然地成长好喽。

时光留声

在父亲的汗流浹背和人们的唏嘘声里,我神奇般触摸到了梦想、信仰,以及关于创造最原始的那份踏实与快乐。

周围放置了许多“7”字卡凳,凳上铺了一溜单行跳板,踏上会颤颤悠悠、惊险而刺激。

夏日的夜晚,父亲躺在他的房子里,望着满天的星斗。我不知道,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里,他都想了些什么。

村子里的孩子三三两两从我家房子旁边路过。他们扛着鱼杆,拎着蚯蚓罐,毫无疑问,他们是结伴到河汉口钓鱼去了。

我不能去钓鱼了,我要和父亲盖房子。我成了随叫随到的小使役,父亲在跳板上,我要给他递烟、递火、递水、递家把什。看着伙计们大摇大摆又幸灾乐祸从河汉口回来,我懊恼至极,心想,这个房子要是这样盖下去,我这辈子都别想去钓鱼了,我的一生,算是毁在这个房子上去了。

过往的大人远远地讥笑父亲,这么个盖法儿,娶儿媳妇还是来得及呢。父亲黑黑地笑了一会,自言自语道,来得及,来得及哩。

令村里人惊诧不已的是,父亲真的竖起了雪水温村头一幅油苦纸盖儿的房子。上房盖儿了,沙岗上站满了观望的人。父亲腰上挂着一个钉子盒,在房顶上叮叮当当走钉,有条不紊。我在地面上手忙脚乱地为父亲穿钉子帽儿。钉子帽儿是用橡皮大小油苦纸做成的,我在一个有漏眼的铁钻上,把钉子穿到苦纸片里,听到父亲高高在上地喊,来钉儿!我便像一样爬上卡凳,翘着脚把穿好钉的钉子供应给前线的父亲。

在父亲的汗流浹背和人们的唏嘘声里,我神奇般触摸到了梦想、信仰,以及关于创

沙丘上的故事

□韩文友

《老屋》 水印木刻 于承佑



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绝望的事。

那个年月,父亲差不多有50岁。

父亲用马车拉来黄土,小山一样堆在“房”后。这种黄土很粘,吐几口唾沫,便可在木板上拍打出汽车、坦克、轮船和无数战无不胜的士兵,在阴凉处慢慢晾干,结实而光滑。我的“看”盖房子的寂寞时光都是在这些拍拍打消磨掉的。我热爱这堆黄土,远胜过眼前这座虚幻的遥无完期的房子。

没有想到,父亲和我一样,无比热爱这堆黄土。他从坡下河汉里挑来水,将黄土和成又稠又粘的大泥,然后将泥浆拌在用木板钉制的长方形模子里,脱出有棱有角的土坯。父亲在“房子”四周摆满了土坯,一排又一排,沙岗上成了列满士兵的战舰,威武而刚烈。有好坯子,才能盖出好房子,就像有一副收嗓子,方能唱得一出好戏。

在雪水房,围墙有几种垒法:一种是冬天伐下碗口粗的柞木、榆木或者桦木,打成标尺的样子,在地基上一层桩子一层泥,直到檐下,曰桩子墙;一种是秋天里备下成捆成捆的柳蒿草,满手抓上一把,拧上劲儿,蘸上泥浆,粗粗壮壮地在地基上盘不盘,叠叠几层,顺着地基还要横上两根细木,再洒灌黄泥以牢固,曰大辫子墙;再一种便是父亲要垒的土坯墙,这种墙的房子周正美观,冬暖夏凉。

父亲把墙垒到一人高的时候,我看出了房子的模样,人便活跃起来,在墙根下跑来跑去,规划着哪里是我的房间,哪里放我的书桌和书桌。

我问,下雪的时候,我们就能住进新房子了吧?父亲抱着一块土坯沉思了片刻,说,下雪的时候才封房盖儿,不能住,太冷。

父亲正在搬弄一个卡凳。他在矮墙的



那三间土房,是在一片沙丘上慢慢长出来的。

这片沙丘在村子里叫沙岗,像一只扣在桌子上的碗,寂寥在雪水温的东北角。沙岗上一片墨绿的玉米,一条小路从玉米地穿过,一垄一垄蹬上去,像爬一条又深又窄的梯子。梯子尽头,就是河汉口,坐在河边就可以钓鱼了。沙岗高处的碗底儿部位,多少年不长秧苗儿,连杂草也不长,光秃秃的,如同一个谢了顶又心有不甘的脑袋。

早春三月,黑黑的雪尚粘在阴沟里,父亲开始动工了。他推来一辆独轮翻斗车,电影里老区农民支援前线的样子,一脸兴奋地把高岗处的沙土推向周边的坡地,一趟一趟,夜以继日。我问父亲为啥要跑岗上盖房子。岗上高,不受水气。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将满车斗的沙土撒向坡下,沙子像泼出去的水,洒成一片,看不出原来的分量。

父亲用了整整一个春天的时间,把东北岗上的沙土推出了一片平地。远远望过去,沙岗不再是一个扣着的碗了,它变成了一个大大圆盘子,四平八稳地扣在了大地上。

转年的春天里,父亲要垒墙了。石头地基是年头的秋天打下的,像一个放倒在地上的大大的“目”字,深深嵌在沙岗上,方方正正。一个“A”型草棚子盖在这处尚不见身影的房山头上,算是临时工棚。早上醒来,我把一擦油饼、一碟煎鸡蛋和一壶开水拎到草棚里,就坐在那儿看盖房子了。

看一个人盖一栋房子,对一个孩子来

渐渐老去。许多年后,我站在远处向那所老房子望去。父亲盖起那栋房子,当年在我眼里高高耸起,如今是那样的矮小,萎缩在同样低矮的一片民舍中间。悠远的天空下,老屋静卧在那片高高的沙岗上,漂泊在我前生后世的记忆里,临风沐雨。他确确老了。

二哥盖起了四间大砖房那年,为了让父亲母亲搬过去一起住,自作主张把沙岗土房子卖掉了。搬家的那天父亲不在,他去沟堂给果树打药了。三辆大车,十几号人,七手八脚就把沙岗搬得空空荡荡,只剩一幢孤伶伶的老房子,了无生气。

一天下午,父亲出去喝酒,夜晚未归。母亲打发我们去找,找遍了所有他常去的人家,不见人影。又去沟堂里看果树的小窝棚里找,仍没有人。那夜下了很大雨,我和二哥的车子陷在路路上,搞得两人浑身泥水,怨气冲天。回到家里已是半旱,自作主张把沙岗土房子卖掉了。搬家的那天父亲不在,他去沟堂给果树打药了。三辆大车,十几号人,七手八脚就把沙岗搬得空空荡荡,只剩一幢孤伶伶的老房子,了无生气。

漆黑的雨夜里,兄弟几人像一群幽灵,在村里村外游荡,寻找我们年愈七旬的父亲。天快要亮了,我猛然想起了一个地方,一路狂奔,跑到沙岗。沙岗的房门虚掩着,老屋依旧空空荡荡,散发着一种潮湿的气味。我推开东屋的门,朝着黑黢黢的屋子说,爸,回家吧。半晌,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黑暗里喃喃道,是友儿吧,快进屋,看,这大雨,咱的房子,一点儿不漏啊!